

※學林誌傳※

吳繼仕的生平、著作及其經學史書寫 ——《六經始末原流》導言

江日新*

前 言

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，經學一科可能是最源遠流長的了。雖然依據傳統經學源流的說法，似乎要到孔子晚年歸魯，專心從事教學及刪述整理傳統文獻，也就是「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、《樂》，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」這些工作完成後，中國的經學授受傳統才算是有個真正的起頭。不過從更原始的起源來看，孔子所繼承的「教學」傳統、乃至他所歸宗的三代前聖以及他這些刪述工作所面對的文獻傳統，當然我們是能夠也必須對它作一個更具譜系考古意義的古典「語文學」或「古代學」(*Philologie oder Allertumswissenschaft*) 研究。

不過由於古典文獻的限制，這種立腳在古典語文學上的古代研究，並不會是一件輕鬆容易的工作。「文獻不足徵也」，自然也就限制了我們對於古典傳統的書寫的可能性。而這也就是我們必須以孔子為肇始，談論經學史傳統的緣故吧！

談到經學傳統的授受源流，事實上只要其傳承既行，那麼對此傳承的歷史書寫，自然也就會緊跟著出現。由此，雖然也許只能算是隻言片語，但如韓非的「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」（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），以至如《禮記·雜記》、〈樂記〉、《左傳》、《晏子春秋》等先秦典籍所述的儒家經

* 江日新，本所研究助理。

典授受¹，事實上已可展現出這一經典形成後的多方分流的授受發展，而它就在不久後的二百年間，已經造就了西漢前期的一個經學史譜系——也就是司馬遷《史記》的《儒林傳》的纂成。緊接著班固也在這個創制下，繼續纂輯他的《儒林傳》，並由此以下，成為中國歷代正史的一項重要史纂工作。

由上面所述的史實來看，在中國的學術史上，經學史的書寫傳統，其實是源遠流長，並沒有受到忽視。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在歷經二千多年的經學傳承、講習，其間作者更是眾多，尤其這一經學的傳承授受，在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的決策下，儒家經典於是更穩當地站上了它主宰中國二千年官方學術，乃至「國家理性」(*Staatsraison*)的地位。而且由此更是轉出多師，於是其間的觀點、論題之異同遞嬗，事實上是有待於更全面、翔實的貫串纂述，也就是說更為專門的歷史編纂、書寫。不過可惜的是，在中國這個龐大的經學文獻中，我們看到的乃是多為注疏箋解之作，而且即使的確也有「諸經總義」一類的著作，但是要求一綜述其歷史源流的著作，卻幾乎是不得一見。

不過筆者在偶然的機會，特別注意到一本明人所撰，並題作「新安吳繼仕公信甫輯說」的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手抄本，於是在經過一連串的蒐求訪察努力，最後終於掌握到一個抄本、一個刻本，以及零星發現到有關作者的生平及著作資料。由於此書似乎極為罕見，提及者極少，今乃就兩本共為校勘，並標以新式句讀，重新排印公布，用供同好研究之資。

而在刊布此書的機緣上，筆者在此卷首並弁以一導論，略述此書的發現、訪求經過、作者生平著作、以及抄、刻二本的異同等，最後再附以一節文字，申說其作為纂述經學歷史之意義，用彰這一本出現在四百多年前的經學史著作對於經學史書寫的意義。以下我們就先說明一下有關筆者發現此書的經過。

¹ 以上各項的經學授受情形，略如《禮記·雜記·恤由之喪》所載：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。」《禮記·樂記》載：「賓牟賈侍坐於孔子，孔子與之言及樂。……賓牟賈起，免席而請……子曰：『居，吾語女。』」《左傳》載：「及其將死也，召其大夫曰：『……孔丘，聖人之後也。……我若獲沒，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，使事之而學禮焉。』」以及《晏子春秋》載：「景公上路寢，聞哭聲。曰：『吾若聞哭聲，何為者也？』梁邱據對曰：『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。明于禮樂，審于服喪。』」以上各條，其實只是多方傳承之一。

吳繼仕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發現

在眾多古代經籍中，清修《四庫全書》所網羅固然已浩瀚而難以竟讀，然而其所摒棄、禁燬、失收的古籍，事實上更是難以計數，何況後代更有作者輩出。因此，要在中國的傳統典籍中偶一獨發佚散的孤本、罕傳本，其實並非什麼大事。因此，筆者在此要敘述吳繼仕這部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發現過程，其實也不是什麼可以值得大書的事情。不過要在重刊這部小書時，交待一下有關版本徵集及點校的文獻依據，故而交待一下此書的發現經過，這也許還是有所必要的。

這件事要回溯到一九八四年，當時筆者有幸獲得教育部公費，前往西德留學。之前筆者由於結識好友馬雷凱博士 (Dr. Roman Malek, S.V.D.)，作為天主教聖言會 (Societatis Verbi Divini) 神父的他，同時也是屬於該修會創設的漢學研究出版機構「《華裔學志》」研究所 (*Monumenta Serica*) 的成員之一。因此，就在拜訪他的同時，得有機會參觀他們附設的圖書館。這個圖書館當時藏書雖約有十五萬本，但由於主要是用作《華裔學志》在編輯上查覈文獻之用，並不是公開給大家使用的，所以一般學者知道的並不多。但由於它原本是作為北平輔仁大學的一個合作機構，而於一九三五年創設於北平，因此它除了擁有數量龐大的西文漢學論著之外，事實上它還擁有相當數量的中文典籍，特別是一些舊刻本。這些舊刻本，據瞭解應該是當時在北平蒐購得來的²。

由於筆者一直對於一些罕見的圖書資料特感興趣，因此把握在短暫的停留時期，大致上對這一機構的藏書內容做了先行的瞭解。不過由於時間匆促，當時只能大概瀏覽、翻閱一下於筆者來說比較難得見到，特別是有關線裝刻本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洋裝舊刊。至於詳細的內容及版本考校，則無暇顧及。

後來筆者入學特里爾大學 (University Trier)。這個特里爾市離波昂約二百多公里，路程並不算遠。同時主持特里爾大學漢學系的喬偉教授，當時仍還住在波昂附近，他同時也是《華裔學志》的熟人，所以筆者得有機會時常順搭便車，北上拜訪

² 據筆者查問自北平時代即已參與《華裔學志》工作的前主編卜恩禮神父 (Heinrich Busch, S.V.D.)，他曾回憶說該社有一位華人助理陳春祥，他在有關圖書資料的徵集上，曾幫過不少忙。而這些刻本許多是從當時北平的舊書店覓得的。

華裔學志社。當時筆者甚至還有把該館線裝書加以著錄成編的想法。事實上也是由於這個想法，而得以仔細一函一函地將其中各種刻本的線裝書，一一翻檢查對，並且發現幾件抄、稿本。吳繼仕這一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抄本³，就是在這一圖書館中翻檢出來的。

如前所述，由於筆者對古典研究的歷史書寫一直懷有特別的興趣，並且希望能在西方歷有傳統的古典語文學研究方法中，稍窺其精粹一二。因為筆者一直認為，西洋古典研究在其語言訓詁傳統中，由於長期以來必須面對其間包含多種語系文獻的解讀、對校，所以自認他們的這一古典研究的方法規模，的確是很值得我們拿來作為改錯的借鏡。這也就是說，筆者所認識到的西方文獻學方法 (textual critique method) 所總集的語文訓詁 (philological)、本文校勘 (textual critique)、註解 (commentary)、釋義 (exegesis)，乃至解釋學 (hermeneutics) 等操作取徑，不但是進入西方人文學（包括哲學）的必要訓練，也可以取用作為重新操作中國傳統文本——對筆者而言，特別是中國哲學文本的一個有用的訓練。而這也是筆者所以特別對吳繼仕這一《六經始末原流》感到興趣的原由。

由於華裔學志社的慷慨，讓筆者能夠將這一共有一百七十七頁的抄本予以影印，並作為筆者的收藏資料。在取獲這一項文獻的同時，其實也引發了筆者不少充滿著困惑的興趣。

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一書稿的撰寫體例。它雖然不是一本今日意義下嚴格組織的「經學史」，但在源流發展的歷時性敘述上，並兼括了一些爭議性論題的進一步討論，它對筆者來說，實已相當具有「經學史」的書寫規模。事實上當我們將它與皮錫瑞的《經學歷史》、甘鵬雲的《經學源流考》做一比較，於我筆者來說，的確有同出一式的感覺，只不過吳繼仕是撰著於明朝萬曆、崇禎年間⁴——也就是四百多年前。不過同時也令人困擾的是，這位明朝時叫吳繼仕字公信的新安人，他更詳細的生平事蹟究竟如何？卻是一直無法找到更詳盡的答案。結果這一份文獻也就隨著筆者返國，而一直沉睡在我的藏書中。

³ 華裔學志社所收藏吳繼仕這部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編目典藏流水帳號為 029112，架號則為 152 / 2322。

⁴ 依吳繼仕為此書所撰的〈序〉，其文末的時間註記是「崇禎戊辰歲孟秋月」，也就是西元 1628 年。

由於未能查獲更詳盡的資料，所以吳繼仕這名字及其可能查考的方向，也就一直縈迴在我的心中。在圖書館中，不管該圖書的藏書如何，都會試著再去找出更多的相關資料來。其中尤其是翻查書目著錄，更是積極。事實上在取得此抄本的影本不久，筆者即於特里爾大學圖書館中，從日本《內閣文庫目錄》查得它藏有刊本。

雖然已掌握到了此書兩個版本的信息，並且還已取得了抄本的影本，不過由於不瞭解日本圖書資料查印的規定，另外也由於一直沒有機會訪日，因此雖明知內閣文庫藏有此書的刊本，但也一直沒有嘗試去取得它。

後來在一個偶然機會，與任教於日本的連清吉學兄談及此書，蒙他答允試著去查問看看。結果在很短的時間裏，就得到他以航空寄來的影本⁵。對此我個人必須向他表示萬分的感謝。

至於這兩個版本在版式上的相關資料，茲略記如下：

- 一、抄本，版式長二十七公分，寬十六公分，文字及空白頁共有一百七十九頁，合訂為一冊。第一頁及末頁各鈐有「張堯倫印」隸體私章一個。此外在第一頁上鈐有華裔學志圖書室中西文合刻的收藏圖章。
- 二、刻本，封面題作《六經原流》，外加典藏登錄及架號貼條二枚，一為中式，一為西式。「日本政府圖書」篆體典藏章鈐於第一頁及末頁，此外第一頁另鈐有篆體「祕閣圖書之章」一枚。版式為長三十一公分，寬十九公分。內文一九一頁，合訂為一冊。

而在內文上，刻本有序，抄本則缺。

吳繼仕的生平著作

吳繼仕這個人物，我們雖然從一些圖書著錄，乃至所流傳下來的著作中，確認他學識相當淹博，可是進一步去查索他的生平傳記時，卻幾乎是不可得。筆者曾試圖查索了近百種明末清初的典籍，除了少數幾句吉光片羽的提示外，可以說幾乎是毫無線索可尋。因此，我們要重建他的生平經歷，大概也只能就其著作中的序跋及各種提要、書目著錄中所透露出的丁點信息來從事了。

⁵ 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這一刊本，現在歸屬日本國家圖書館保管。其典藏登錄及架號為「漢書經 31、2/13292 號/全 1」。

首先有關吳繼仕的生平地望，就作者所蒐集到吳氏著作的作者題名來看，基本上有題作「明新安吳繼仕公信甫編纂」（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⁶）或「新安吳繼仕公信甫輯說」（《六經始末原流》）及「明新都吳繼仕考校」（《七經圖》）等。

不過在字號稱名上，除了上述的名字「繼仕」以及可能是字的「公信」外，另外還有稱為「蒼舒」的叫法。這特別是在《四書節解圖考》一書由貴池吳應箕及其弟子貴池劉廷鑾所撰的二篇〈序〉中可見到。吳應箕的稱法為：「甲戌春，過新安丹山⁷，聞有吳蒼舒先生者。」至於吳應箕弟子劉廷鑾的〈序〉則承師說稱作「休寧吳蒼舒先生」。另外，再根據劉尚恒《徽州刻書與藏書》⁸所引乾隆四十六年兩江總督薩載奏准《外省移咨應毀各種書目》中有關《建州考》一書中的說法：「以（此）蒼舒系吳繼仕之號。」以是我們大概可以確定吳繼仕的名字及號為「吳繼

⁶ 這部書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部，書內首頁書名簡題作《四書圖考》，作者並題為「吳次尾、吳公信兩先生纂輯」及「金閭黃百行梓」等字。正文起首書名及作者則分別題為「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」及「明新安吳繼仕公信甫編纂，秋浦吳應箕次尾甫點定，吳文英子含甫、吳聞禮去非甫參訂」等字。

⁷ 吳應箕稱吳繼仕籍貫為新安丹山。唯據《休寧名族志》及《休寧縣志》等資料考之，吳繼仕這派在休寧隸為隅都中第二十三都的商山。事實上在《休寧名族志》中，甚至曾於其人物綱目記「儒碩」項下註：「吳繼仕，商山人，別駕。」詳情參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所刊行《徽州名族志》中第二冊所收的《休寧名族志》之〈休寧名族志人物綱目〉儒碩項（北京：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，2003年），頁681。唯此綱目註言各人物，可在各姓族志中檢閱生平行誼，惜所刊出只一、四卷，收入吳姓的二、三卷佚失，以是不可讀得吳繼仕行誼，實至為遺憾。

然前引吳應箕所說丹山，疑或為商山之誤筆或另稱。至於商山一稱，見載於多份休寧文獻，故當以此為正確地名。另外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，有研究生李昱穎以吳繼仕《音聲紀元》撰作碩士論文，題為《音聲紀元音系研究》（此論文並收入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》第46號〔2002年6月〕，頁547-701），其中於籍貫引《音聲紀元》重刊本（萬曆四十三年），中有「舟山吳繼仕公信甫著」，並援推為浙江外島之舟山，且釋以為吳氏因刻書需木材，故遷至舟山。此推論實太過臆測。且根據李君所引版本附圖重檢，其字結體應作「丹」，實無「舟」字上頭之撇，以是較之吳應箕之稱「丹山」，該字當確為「丹山」，至於何以稱「丹山」，我個人則懷疑商山又別名為丹山。李昱穎所說，請參上揭《師大國文所集刊》，頁559。

⁸ 劉尚恒：《徽州刻書與藏書》（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3年），頁356。

仕，字公信，號蒼舒」⁹。

至於他生卒的時間，我們則確然是無法查得了。

雖然我們無法確定吳繼仕的生卒年，但由於他各種著作中的〈序〉都記有明朝皇帝的年號及干支，所以我們可藉此來推估他大概的活動年代。

在筆者所能掌握到的吳繼仕著作中，其各〈序〉的紀年，可依其先後抄列如下：

一、《音聲紀元》，焦竑〈序〉作於萬曆辛亥（三十九年，1611），吳氏〈自敘〉亦紀同年。

二、《七經圖》，焦竑〈序〉作於萬曆乙卯（四十三年，1615），吳氏〈自敘〉亦紀同年。

三、《六經始末原流》，吳繼仕〈自序〉紀為崇禎戊辰（元年，1628）。

四、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，吳應箕〈序〉紀為崇禎丙子（九年，1636），吳應箕弟子劉廷燮〈序〉亦紀為崇禎九年。

以上諸書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這部大著前冠的吳應箕及劉廷燮的〈序〉了。首先，由於此書已不再冠有吳繼仕〈自序〉，此或許亦透露某一種有關他的存歿消息？尤其是我們在吳應箕的〈序〉中可以讀到：

甲戌（按：即崇禎七年，1634）春，過新安丹山，聞有吳蒼舒先生者。……

⁹ 有關吳繼仕字號的稱法，前引李昱穎論文，亦有所論列：「自趙蔭棠之後的研究學者，皆以『公信』為吳繼仕的字號，王松本（2000，頁262），以為吳氏除了『公信』之外，又字『信甫』，筆者（2001，頁17）原本採用此說。然而，從吳繼仕熙春樓刻本與重刊本進行比較，認為重刊本是由吳氏侄孫校訂，『公』字表示尊稱。然而，今以熙春樓版為本，吳氏自稱信甫，由此可知：在焦竑、詹國衡二人所作的〈序〉裏，焦竑稱『公信氏』、詹國衡稱『公信』，有兩種可能：一，『公信氏』的氏可能為『甫』字之誤，稱『公信』可能為闕字之誤。二，又一字『公信』，然而，這個說法即便又否定了『公』為尊稱的解釋，故以第一說法較為妥當。因此，筆者推測：吳繼仕字信甫，號蒼舒，其書室名曰『熙春樓』（或作『熙春堂』）。」（李昱穎：《音聲紀元音系研究》，頁558）

對此以「公」字為尊稱而推出吳繼仕字信甫，這樣一種推敲，實是用功太過。若要尊稱，我們稱為××甫實是古來常有之例，這如先秦的「尚父」，而「父」與「甫」相通，亦同樣有尊稱之意。事實上，我們比較其他各種吳繼仕的著作及傳記資料，他的字的確是「公信」，公信甫也就是公信先生，至於號，蒼舒則無誤矣。倘若硬要以「公」字為尊稱，而強信字並甫字為一成辭，那麼其侄孫吳祚長孺甫亦應稱作吳祚長儒甫，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中「秋浦吳應箕次尾甫點定」亦當作「秋浦吳應箕次尾甫點定」，以及「吳文英子含甫參訂」作「吳文英子含甫參訂」、「吳聞禮去非甫參訂」作「吳聞禮去非甫參訂」乎？

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，貲鉅萬以是廢，布衣蓬戶，屏絕外營，其行義無愧古儒者。……

又劉廷鑾的〈序〉也說：

休寧吳蒼舒先生，博學多聞，浮湛六籍之旨，以明經強仕歸，肆力典墳，老而不倦。……歲甲戌，吾師次尾先生遊丹山，蒼舒乃過從焉。盡發其藏以質，自今而後，可傳之其人也。吾師拔冊以還，授鑿曰：「經學之興，其在斯乎！其在斯乎！」

在上引這兩〈序〉中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吳應箕有「棄官著書將四十年」的說法。於此並相較於吳繼仕本人對他自己這本書沒有〈自序〉，而且交由吳應箕處理，並共列名為纂輯，和由金閻黃百行梓行，這似乎都透露出吳繼仕本人或年已耄耋、或身已遽歸道山了。因此，才一反常例，在卷首少卻他自己的〈序〉文。事實上，當我們從吳應箕的「棄官著書將四十年」一語來推估，在棄官前，至少亦有二、三十年的生平及社會經歷，即使我們將其卒年推估至早在崇禎九年前後，再以七十歲為長壽的話，於是可得吳繼仕的生年最早約當在隆慶初前後（即西元一五六六年前後），而卒年則在崇禎九年前後，至於更精確的推估，則只有俟之未來出土的文獻了！

至於吳繼仕的出身或功名，我們從前面吳應箕的〈序〉中所謂「棄官著書將四十年」，另外《休寧名族志》¹⁰中則註記：「吳繼仕，商山人，別駕。」可知他曾出仕當過小官。依此，我們於《休寧縣志》中的《選舉志》雖找不到有關的資料，但在劉尚恒《徽州刻書與藏書》中卻發現有這麼一段記載：

吳繼仕，字公信，號蒼舒，明萬曆、崇禎間休寧人，嘗以貢生授耀州判官。……¹¹

這與《休寧名族志》的別駕，倒有相當的呼應。然而由於他好學，尤其更精於治經，因此早早就去官歸田，專心著述，並纂行許多著作。其中被歸於他所主持的坊刻，亦即頗受好評的「熙春樓」刻版，對此我們也許可以再引一下徐學林《徽州出版史敘論》中的一段評論作為見證：

休寧的經學家吳繼仕的熙春樓所刻自著的《六經圖》、《音聲紀元》、《七

¹⁰ 《休寧名族志》（北京：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，2003年）。

¹¹ 劉尚恒：《徽州刻書與藏書》，頁356。

經圖》、《四書圖考》等經部圖書為當時的名版，向為士林所推崇，至今仍為國家級善本書。其中《六經圖》六卷後有「圖像俱精，字紙兼美，一照宋本，核刻無訛」的廣告式識語，比之實物也毫不誇張。¹²

由此我們可以確認到一點，吳繼仕似乎是兼有居家學者以及出版商兩個身分在社會上活動。另外，我們從他的著作多經名人如焦竑、吳應箕作〈序〉推轂，可推見他的學問當亦有值得這些大學者、名人的推崇之處。事實上，就吳繼仕的著作來說，我們即以見知著錄來看，其數量不在少數。以下我們將其書名抄列如下，至於其各書的內容提要，筆者將匯聚成一帙，附錄於書末，用供對吳繼仕研究有興趣之同道參考。

- 一、《六經始末原流》（不分卷），崇禎元年刊本，又有崇禎十三年刊本及藏於德國華裔學志圖書室抄本。
- 二、《七經圖》七卷，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序刊本，萬曆四十三年吳氏熙春樓刊本，萬曆年間六語堂刊本。
- 三、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十七卷，崇禎九年丙子刊本。著錄書題多簡稱《四書圖考》¹³。
- 四、《音聲紀元》六卷，萬曆三十四年辛亥九月徽郡吳氏熙春樓刊本，萬曆重刊本¹⁴。

¹² 徐學林：《徽州出版史敘論》（合肥：安徽美術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44。

¹³ 有關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或簡稱《四書圖考》的著錄，由於有些著錄中作者題名為吳蒼舒，且與吳繼仕名別行，以是有些作者誤為兩作者之書。其中如傅武光《四書總義著述考》（一）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3年）中，其第1536條著錄吳繼仕《四書引經節解圖考》十七卷（按：著錄中「圖考」記作「讀考」，或為筆誤），又於第1538條據《經義考》著錄吳蒼舒《四書圖考》，並註記：「吳蒼舒，作者事蹟待考。」

事實上，在安徽通志館編纂《安徽省安徽通志稿》（二十五）《藝文考·四書類》著錄《四書圖考》，就僅題吳蒼舒撰，以及《群經總義類》著錄《七經圖》為吳繼仕編，另更根據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著錄有吳蒼舒撰《七經圖考》。其間錯出，或因此而導誤焉！

¹⁴ 此《音聲紀元》依據杜信孚《明代版刻綜錄》（揚州：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83年）所述，又有稱題作《音律紀元》及《聲音紀元》者。至於其刊板，依前引李昱穎《音聲紀元音系研究》針對版本的比較分析，共列有一、明萬曆辛亥（三十九年，1611）徽郡吳氏熙春樓刊本；二、明萬曆間重刊本；三、（香港）長城文化出版公司輯印「《罕見韻書叢編》」所收錄版；四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版。詳情參見頁561-562所論。

- 五、《易占》一卷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六十二著錄，云未見。
- 六、《易辭述旨》二卷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六十二著錄，云未見；又見錄於清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。
- 七、《易數》三卷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六十二著錄，云未見。
- 八、《七經圖考》，吳應箕《四書圖考》中揭及。
- 九、《三禮定正註疏》，吳應箕《四書圖考》中揭及，並著錄於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一六五，云未見。（按：此或疑即《六經始末原流》末所附論〈三禮集註序例〉中所自述「是以不揣愚分，因昔賢之旨、諸家之說，定為一編，名曰《三禮定正集註》」的著作。）
- 十、《周易象變述旨》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六十二著錄，云未見。
- 十一、《經原統宗》四卷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二四九著錄，云存。對此茲疑與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為同一書，然因未見其書，且不見他種有更明確述及其內容之著錄，因此不敢獨斷，存疑於此。又《經義考》附引「查嗣琛曰：『繼仕，字公信，徽州人。』」
- 十二、《建州考》，劉尚恒《徽州刻書與藏書》錄載按語「據乾隆四十六年□月□日據兩江總督薩載准奏，見《外省移咨應毀各種書目》」著錄。

以上大略敘述了吳繼仕的生平著作，然因文獻不足之故，我們必須留下許多闕疑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，或許也是學界百尺竿頭、更進一步的可能所在。以下我們再轉回到《六經始末原流》這本書的一些版本校勘的問題上去。

關於抄本與刻本間的版本比較

在我們所掌握到吳繼仕這部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兩個傳本中，就其直接的分卷裝冊來檢視，其目次存有直接的差異，即刻本與抄本間的分卷裝冊次序是不同的，底下我們將它們分兩欄對比如下：

一、刻本	二、抄本
〈六經本末原流序〉（按：原書作如此）	〈缺〉
〈六經始末原流〉（按：亦即總論）	〈六經始末原流〉
〈周易原流〉	〈周易原流〉
〈尚書原流〉	〈葩經原流〉

〈葩經原流〉	〈樂經原流〉
〈麟經原流〉	〈麟經原流〉
〈樂經原流〉	〈三禮集註序例〉
〈三禮原流〉	〈三禮原流〉
〈三禮集註序例〉	〈尚書原流〉

在這一表列中，我們可以明白看見，其中有關分卷裝冊有前後錯出的差異。不過其根據究竟為何，我們似乎很難知曉。事實上就傳統《六經》排序來看：「今文家的次序是(1)《詩》，(2)《書》，(3)《禮》，(4)《樂》，(5)《易》，(6)《春秋》。古文家的是(1)《易》，(2)《書》，(3)《詩》，(4)《禮》，(5)《樂》，(6)《春秋》。」¹⁵

在與經今古文的排序相比較下，刻本的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前三項是符合古文家的家法，但後三項中的《禮》與《春秋》則是相互錯置。至於抄本的《六經始末原流》在其裝冊上則可以是完全淆錯，根本沒有章法可言。因此，筆者以為抄本在各題的排序上，可能是隨意拼集而裝訂成的。

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抄本與刻本間的關係究竟為何？依筆者仔細對校這兩個本子後，認為最具關鍵性的指標是每字在謄抄時，其筆畫結體的對應關係。事實上這個抄本大致可以稱作精抄本，雖然在書法上它並不精美。筆者之所以稱它是一個精抄本，乃是因為抄本中每一個字的筆畫結體，幾乎是完全規模於刊本的字體。由於這一點，筆者還曾以為可能是原本的謄定稿。

但這個抄本究竟是否為原本的謄定稿，筆者並不具備其有關的鑑定能力。因為這是要在紙張、書法以及許多其他版本知識上，卓具慧見與長期經驗的條件下，才有可能的。我個人既不是版本學者，也不是文物鑑定專家，所以總是將其版本年代問題置於一旁不論。

不過為了要以新式標點點斷出這部書，以公諸學者，筆者也利用機會更仔細地對校兩個版本。結果發現，抄本的確很仔細地規撫如同刊本的筆畫結體。事實上也也要感謝刻本一開始就採行了許多變體字，因而在這個複雜的筆畫結體中，抄者因放

¹⁵ 參見周予同《經今古文學》第二節〈經今古文略同示例〉，原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26年單行出版，本文所引是用朱維錚編《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》（增訂版）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所收的本文，見頁4。

鬆或偷懶，在減筆或漏筆之下，透露出此抄本可能是晚出的，也就是它很仔細依原刊本的筆畫結體謄抄，甚至在每字、每行的位置上，精準地依循刊本的版式。但其中所疏忽而留下的錯字、誤筆、減筆，筆者則加以校勘，並以當頁註的方式，並列於頁尾，用供不見有此抄本者，亦能對其筆畫瞭然於心。至若能更精準地為學者提供版本學上的直接明證，也許有俟於有心的出版商將此二本影印重刊，屆時多識學者當會有比筆者愚拙之見更多發現和更深入的認識。

作為經學史書寫的《六經始末原流》

經學既經成立，自有授受傳承，而這亦即是經學史所以底據者。尤其是在漢朝或之前，由於學校講習乃至授官任事的人才陶成，多遵於傳統的教學制度。因此，儒家一脈相承，用為講習之資的六藝，也就是衍為《六經》的教學內容，更由此而一線不墜，甚至在家承師說的傳承下，一步步被提升為「博士」，直接擔負起官方授權的教學權威。而這教學權威其實同時也成為該文化傳統，乃至精神價值所以底據的陶冶理想所在。

我個人實際上並不是在經學史中浸潤歷有年所的專家，但作為一位要面對古今中外上下三千年文明創造的哲學學生，對於能精準抉發經典文獻、解釋傳承的學術史工作，一直是懷有極深的景仰之意，「身雖不能之，心則好之」。因此，在接觸到吳繼仕這部《六經始末原流》，筆者直接地就把它想成是一部撰寫於四百多年前的「學術史」，因而也好奇於其如何形成它在「歷史書寫」中的史學反省。

歷史書寫本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「左史記事，右史記言」，這是中國史學傳統的開始；「探問民風」(*historia*) 這是西方史學傳統的開始。但是當所採所記已進入一種精神傳承及解釋的遞嬗遷變時，那麼一種嚴整的學術史，特別是對於在中國傳承兩千多年的經學史，其究竟要以怎樣的方式來書寫，當然也是一個急迫的問題。有趣的是在晚明這個時代，突然冒出了不少學術史的總論之作，例如黃宗羲的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，孫奇逢的《理學宗傳》，萬斯同的《儒林宗派》等等，均有可觀之處。延續到清朝乃至民初，這種學案式的學術史書寫，一直是不絕的。但在四百多年前突然冒出的這一《六經始末原流》的書寫傳統，它不但沒有賡繼者，甚至一直淹沒無聞。一直到清末，才再由皮錫瑞的《經學歷史》來重開經學史的書寫。並由此而更進一步地刺激了中、日的許多學者投入研究、撰述工作。

吳繼仕的這部古老著作，我們若要將它拿來放在今日已蓬勃發展的經學史論著中，它究竟能博取什麼樣的尊重和地位呢？

他這部建立在經學的授受圖——事實上是在楊甲《六經圖》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再去發展的《七經圖》。但經圖中的授受原流，便出了一些爭辯不休的議題。於是吳繼仕就在這兩項接點上，構作出他的《六經始末原流》。

他的著作放在今日的研究成果及規模來看，似乎也是一件古董的東西，但若以一種知識考古的態度，重回到他如何在一片傳統宰制的學術禁錮中，突發出一個迸裂契機，那麼他的經學史書寫，也許就有一些可以供我們重新省思的接點了。更何況，就在他的經學論著中，同時又隱約浮現的「經學向宋儒歸宗」——特別是經學中的朱子學因素，雖然這一宋儒因素在清代經學中一直受到指責，但在鬆弛了清儒的偏見和意識形態後，吳繼仕經學中的宋儒因素，尤其是他的經學書寫中所隱藏的變相，是否又可以為我們這一後現代的歷史書寫自由，稍開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呢？這尤其是當我們將他的《六經》認知，以及他在文字與圖像、音聲與樂律，乃至禮儀的繁文與威儀間，予以相互結合的想法，也許會是我們在經學研究上的一個新啟發靈感。這也就是說，例如現今唯一針對吳繼仕著作深入研究的李昱穎的《音聲紀元音系研究》，她如果能夠留心及《六經始末原流》在繫於〈樂經原流〉下的律學論述，那麼我就認識到，吳繼仕的《音聲紀元》較之於單純的音韻學，是另有更深一層的經學關聯或文化語音學的向度。另外如三《禮》的相互關聯繫屬，尤其是在文本上是否可以有一《經傳》相繫的文獻處理，也就是一個發現古代文本相互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解釋的可能性。而相對於此的展開，也許吳繼仕的經學史書寫的想法，會是我們未來研究經學上的一些靈感提示。